

靖国神社里的印度人

本报记者 王昱



一周史记

下周史上那点儿事
(1月13日—1月19日)

本周,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访问了印度,并与印度达成了新的防务合作协议。1月26日,安倍晋三也将访印并观摩阅兵式。对于近期不断加强的日印关系,有印度媒体直言不讳地将之解读为“印度与日本用军事关系构建反华长城”。相比之下,倒是日本媒体显得含蓄一些,据经新闻网站猜测,安倍此行可能仍会去拜会一下他家在印度的“外交”——拉达比诺德·帕尔的后人,以显示日印关系的深厚。

这个帕尔,曾在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中担任法官,熟悉安倍家事的读者应当知道,他姥爷岸信介,正是当年在东京审判中差点遭到起诉的甲级战犯嫌疑犯。现实生活又不是印度电影,法官和嫌犯之间是咋论上交情的呢?下周1月19日,正是远东国际法庭成立纪念日,我们不妨就来说说其中的经纬。

如果你看过电影《东京审判》,或许会对其中一个场景感到义愤填膺——在最后的定罪阶段,当中方法官梅汝璈要求对甲级战犯处以死刑时,法官团中的印度代表坚决反对。他基于宗教的宽容原则,坚决要求“宽恕”这些战犯。这个人就是帕尔。不过,现实中帕尔的主张更难以让中国人接受——他根据一套看似“严密”的法理推演,直接主张甲级战犯无罪,甚至整个日本也无罪。此

公的主要观点有三个:

首先,帕尔认为,远东国际法庭既然是法庭,法官就必须立场中立,但国际法庭的法官团实则是一个由各战胜国组成的“代表团”。帕尔说,这种胜者对败者的审判公正性可疑。

其次,帕尔认为,远东国际法庭多采用第二、第三手证据,换言之,就是受害者、证人的证词和笔录,而这些证据在英美法系中是无法独立定罪的。他指责法庭,“我们是在对激动的或有偏见的目击者所作的证词进行总结。”因此,他法庭论罪的基础提出质疑。

第三,也是帕尔最为强调的,他认为远东国际法庭审判的法律依据不可靠,远东国际法庭是依照1946年战胜国签署的《东京宪章》进行审判的,帕尔就揪住这一点,认为这是典型的“事后立法”,而事后

立法从法理学上讲是不能追诉前罪的。

帕尔这种明显是在袒护日本的“无罪论”,远东国际法庭最终当然未予采纳。不服输的帕尔之后写了洋洋60万字的《日本无罪论》,此书让日本右翼如同捞到了救命稻草,东京审判结束至今60多年中,日本右翼分子沿着帕尔的这几条思路做延伸,分别长出了“战胜国审判”论、“南京大屠杀虚构”论、“侵略定义未定”论这几朵奇葩。为了给教会他们这套“翻案武功”的祖师爷树碑立传,2005年,靖国神社里竟然竖起了“帕尔显彰碑”,身为东京审判法官的帕尔与当年的被告共享祭祀。2007年安倍访印时,甚至还特意见了帕尔的儿子,向他父亲当年的“高行勇气”表示“敬意”。

其实,安倍完全搞错了,支撑

帕尔当年为日本辩解的并非什么勇气,而是个天大的误会。作为早年追随甘地的民族主义者,帕尔和他那一代印度精英对日本都抱有一种幻想,觉得这个唯一跻身世界列强行的亚洲国家,会替亚洲兄弟们主持正义,帮他们赶走英国人。这种幻想本来也很好解除,中韩等国就是实实在在见证了日本式的“解放”而幻想破灭的。偏偏印度离日本太远,是块让日本帝国鞭长莫及的肥肉,于是印度在二战中只享受了日本对其独立运动的资助,却没遭受过它的荼毒,站在印度边上晃了一圈的日本侵略军就这么被误会成了“解放者”。这种误会,从当年帕尔的《日本无罪论》开始,直到印度媒体对“日印同盟”的报道为止,仍然看不出消解的可能。日印之间的友好,看来真是对“距离产生美”最好的阐释。

缅甸:

“再没有政治犯了”?

1月3日,缅甸13274名囚犯因为总统吴登盛签发的特赦令重获自由,其中至少包括8名政治犯。

据《缅甸新光报》报道,去年12月30日,吴登盛签发特赦令,赦免了全国监狱收押的11124名男囚和2150名女犯。根据特赦令,刑期少于40年的囚犯可减刑3/4;如果服刑时间满足减刑后的刑期,立即释放;刑期超过40年的,减刑为40年;被判死刑的囚犯转为终身监禁。

吴登盛还赦免了所有政治犯,对于正在庭审过程中的政治犯撤销诉讼。

去年7月吴登盛访问英国时,曾公开承诺在年底前释放所有政治犯。这位被西方看作改革派的总统,不得不信守承诺,赶在新年到来前发布了特赦令。缅甸政府高级官员木苗表示,特赦有五大理由:为了和平,出于人道主义,为了民族和解,让犯人参与政治议程,为了重建国家。

12月31日,缅甸总统发言人耶塔通过脸谱网宣布,总统已兑现承诺,缅甸“再没有政治犯了”。

这次释放政治犯,专门针对因非法结社、和平集会、叛逆和煽动等7项罪名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政府没有公布释放政治犯的数量,当地人权组织估计,应有超过200人获释。

但是,很可能仍有一些人被关押,因为这些政治犯还有其他罪名,比如逃兵或谋杀。缅甸援助政治犯协会的钦楚敏对缅甸民主之声网站说:“他们号称会释放所有政治犯,但他们没有。不过,总比一个都不放要好。”根据该组织掌握的资料,有100多名待审的政治犯因其他罪名被起诉,比如妨碍公务和诽谤。

曾是政治犯的革丁埃也对特赦不满。“政府号称正在将缅甸从独裁国家转变为民主国家,但他们逮捕帮助实现这一转变的人,这太矛盾了!所有政治犯都应该被释放。”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赞扬吴登盛政府特赦政治犯的举动。从缅甸政府开始改革,已经先后释放了1300多名政治犯。同时,人权组织强调,政府的努力仍然不够圆满,许多政治犯获释后很快再次被捕;只有废除允许政府逮捕批评者的法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犯问题。

俄罗斯:
赶在索契冬奥会前放人

1月5日,被释放的俄罗斯政治犯霍多尔科夫斯基在瑞士接受了瑞士公共电视台的采访,宣布将为俄罗斯的政治犯而战。“当你知道那些政治犯正在监狱中受难,你就很难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



去年12月31日,囚犯走出缅甸仰光夫人监狱,受到热烈欢迎。之前一天,缅甸宣布特赦羁押中的大多数政治犯。

在很多国家,“政治犯”是个含义复杂的词汇——政府觉得它难缠且刺眼,希望忽略它的存在;社会活动家和反对派认为它崇高而光荣,可以成为未来的政治资本;媒体和网民认为它神秘又刺激,象征着无数内幕、交易和谈资。

人们至今无法统计,世界上有多少国家有政治犯、共有多少政治犯被关押,但,释放并停止制造政治犯却已成为国际共识。

特赦玄机

去年12月18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普京提交的议案,在该国宪法实行20周年之际进行特赦,大约两万名囚犯将重获自由。除了霍多尔科夫斯基,还包括反对普京在北极进行石油勘探的绿色和平组织活动家,以及女子摇滚乐队“造反猫咪”的成员。

去年12月20日,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记者会上以民权斗士的姿态说:“我希望你们记得,我并不是俄罗斯最后一个政治犯。”他表示将为俄罗斯仍在狱中的政治犯斗争,直到最后一人被释放为止。

石油寡头霍多尔科夫斯基是俄罗斯最著名的政治犯,他一度成为俄罗斯首富,手中的金钱和权力足以左右政坛。普京上台后,他开始资助反对派组织,公开对普京政府的腐败表示异议。西方媒体当时普遍认为,霍多尔科夫斯基获得的政治信任和声誉,让普京政府感到紧张和

害怕,因此操纵司法系统将对手关押起来。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数罪并罚,刑期直到2014年8月。

有人认为,普京在此时释放政治犯是为了在索契冬奥会开幕之前,改变国际社会对俄罗斯人权状况的看法。

加拿大《环球邮报》指出,释放霍多尔科夫斯基等政治犯,显示了普京的自信:在经历两年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后,他再次成为俄罗斯政治的主宰。

伊朗:
或释放反对派关键人物

1月4日,3名逊尼派政治犯因绝食抗议而在伊朗Ghezel-Hesar监狱昏迷。他们与另外3名政治犯从去年11月4日开始绝食,要求得到公开审判。

昏迷的贾姆希德·德汉、卡迈勒·马塔力和哈米德·艾哈迈迪被

转移至监狱诊所,清醒后又重回牢房。很快,德汉第二次陷入昏迷。

被关押的政治犯称,绝食抗议是惟一能让当局听到他们声音的方式。据伊朗NCR-Iran网站报道,狱医称,如果这些人继续绝食,等待他们的只能是死亡。狱警也表示,监狱的预算不足,不会给被狱医“判死刑”的犯人提供药物。

总统鲁哈尼上台后,伊朗做出了与西方世界和解的姿态,释放政治犯则被看作加入文明社会的“投名状”。国际和伊朗国内的声音都在督促鲁哈尼释放政治犯。

从2011年2月起,前总统候选人、反对派关键人物米尔·侯赛因·穆萨维和迈赫迪·卡鲁比就被政府软禁在家。鲁哈尼告诉英国《金融时报》,他的政府已准备好对这两位公民“履行责任”,但是“在这个国家,有些事情需

要其他部门官员的共识”。

英国《每日电讯报》认为,鲁哈尼是在暗示伊朗国内的强硬派给释放政治犯“暗中使绊”。

去年12月7日,鲁哈尼在德黑兰大学演讲时,被学生要求释放反对派领导人的呼声打断。鲁哈尼则呼吁学生容忍和拿出耐心,要相信“理性和节制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去年9月,鲁哈尼政府释放了80名政治犯,他们中有些人是2009年参加反对内贾德连任总统示威游行时被捕的,还包括个别人权活动家,比如女律师纳尔斯林·索托德。2010年9月,她因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宣传”被捕,被判入狱11年,20年内禁止从事法律工作和离开伊朗。

据法新社报道,伊朗政府发言人透露,释放穆萨维和卡鲁比也在鲁哈尼的议程表上。

文/张慧 据《青年参考》